

听文物讲故事，品中华之璀璨

何尊与鎏金铜蚕：

「宅兹中国」，拥抱世界

大立人与小陶猪：

站直腰板，永不言败

从史前文明，到赫赫秦汉，再到强盛隋唐……被誉为“天然历史博物馆”的陕西省留存着灿若星辰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不仅标记着中华民族悠长壮阔的国族历史，更建构了中华文明自信包容的文化基因。

现藏于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便是陕西的代表性“国宝”之一。

何尊 1963 年出土于宝鸡市贾村镇，兽面纹、青铜色，在沉淀了 3000 多年之后，它周身散发着神秘凝重的气质。文物工作者在清理掉表层的斑斑锈迹后，在何尊的内底发现刻有 12 行共 122 字的铭文。这段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建造陪都的重要历史事件。

特别是这铭文中出现了“宅兹中国”四个字。此前发现的殷商甲骨文卜辞里，“中”和“国”两个字都不曾见有连用。“中国”，第一次被发现于铸造在公元前 1038 年的何尊铭文之中。

专家说，在华夏先民聚族而居的初期，“中国”最初只是一个方位区划上的概念，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何尊铭文中最早的“中国”一词，既体现了周王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也标志着早期“中国”概念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

连何尊在内，在陕西，522 家国有文物收藏保管机构中收藏有可移动文物 7748750 件，全省共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 49058 处——这样一组数字，不仅实证了中华文明的悠远与丰富，更见证着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与交流。

1984 年 12 月，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池河镇几位农民在河水中淘金时，在沙坑里发现了一枚几乎和真蚕同样大小的鎏金铜蚕。这件铜蚕通体长 5.6 厘米，上身略微弯曲，头部微微上扬，就像正要吐丝的样子。经专家鉴定为汉代鎏金铜蚕，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这件铜蚕是一件圆雕作品，细部刻画写实具象，首尾 9 个腹节，腹足、尾足做得非常精细，连腹部凹痕都清晰可见，上扬的头部，凝固了它即将吐丝成茧的生动神态。

正是这小小的、柔软的蚕，带来了象征财富的丝绸，它是万里凿空的金钥匙，更是文明交流的守望者。

而那些在漫长丝路上流传着的传奇故事，则既展现出人类技术文化交流由古及今、驰而不息的节奏，又印证了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面向世界时所展现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胸怀。

从 2000 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到如今，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合作、文化交流越来越紧密。前不久，中欧班列长安号开通了跨里海、黑海班列，这一新线路采用铁路、海运等方式进行联运，可辐射中东欧多国。目前，从陕西西安始发的中欧班列长安号，已常态化开行了 16 条主干线，覆盖“一带一路”沿线 45 个国家和地区。

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

如果说遥远三代之时铭刻于何尊之上的中国二字，是炎黄子孙对自我的认知与认同，那么强汉时的鎏金铜蚕则象征着华夏儿女与世界交流沟通的强烈愿望。一头是自立自强，一头是合作共赢，连接两头的正是中外人民对和平与幸福生活的共同向往。而这些文物珍宝，则无声又无尽地诉说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共同的秉性与情感；昭示着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人类各民族共同用文明之钥开启合作共赢之门的光明前路。

（记者杨一苗、姜辰蓉、陈昌奇）
新华社西安 5 月 18 日电

云冈大佛与吃饼胡人：

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历史记忆

文物是打开历史记忆的钥匙。在我国民族文化“大熔炉”山西，一件件别致的文物，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璀璨明珠，蕴含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位于大同市的云冈石窟，代表了公元五世纪世界美术雕刻的最高水平，有专家称其为“东方佛教的第一圣地”。其中第 20 窟露天大佛高约 13.7 米，着袒右肩式袈裟，端坐于石台座上，神情庄严、慈祥泰然。其衣服上既有云冈特有的衣纹形式，又有联珠纹、忍冬纹等西方传来的装饰图案。

“这尊佛像体现出一种融合创新的气质，它既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也融入了鲜卑族的精气神和审美情趣。”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说。

如果说云冈大佛象征着精神层面的交融，经济生活交往融通的弦歌也在长长的商道上响彻三晋之地。

山西博物院珍藏着一件生动的胡人吃饼骑骆驼。骆驼高大健壮，张嘴嘶鸣，驮着沉甸甸的皮囊等物，一名胡人骑坐在上面，头戴圆帽，浓眉深目，鼻梁高挺，左手握缰绳，右手持一饼，嚼得津津有味，看表情仿佛在说：嗯，真香真香……

这件隋代“胡人吃饼骑骆驼”出土于太原的斛律御墓。考古报告显示，墓主斛律彻为北方高车人，家世显赫。其远祖是敕勒部首领，曾率部投附北魏，担任朝廷要职；他曾祖父斛律金善骑射，官至北齐丞相；他祖父则是北齐著名大将斛律光。至隋朝时，斛律家族已完全与华夏文明相融。

“随葬品一般是墓主人在世时的生活反映。这件陶俑反映了丝绸之路上贸易往来的景象，当时达官贵人与这些远来的商人们接触频繁，而由他们带来的各地商品与生活习俗则渐渐融入市井，成为后世中华大地上人间烟火的一部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庆捷说。

文物印证着三晋大地古已有之的开放基因和重商传统。不久前，《山西省“十四五”“一带一路”开放型经济发展及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规划》发布，山西将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大商圈，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谋求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高速度发展，率先蹚出一条转型发展新路。

近日，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中鼎物流园内，太重高铁车轮、忻州法兰、朔州陶瓷等“山西制造”走向世界。2021 年，山西省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 2000 亿元，规模、增速均创历史新高。2022 年年初，《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为山西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实施首季，香椿、苹果浆、羊毛产品等多种山西特产首次走出国门……

1500 年前开凿的云冈石窟，用其雄奇壮美记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型成长的故事，留存住中华文明包容开放的印记；1500 年后，不断开放的三晋大地向世界证明，新时代的中国人民既有开放包容的大格局，更有融合创造的大智慧。

（记者王学涛、王皓、陈志豪）
新华社太原 5 月 18 日电

董鼎与伯矩鬲：

京华大地“鼎”天“鬲”地三千年

3000 多年建城史、800 余年建都史……北京以其历史之悠久、积淀之深厚，傲立世界首都之林。

在房山琉璃河遗址发现，发掘之前，北京的城市起源一直是悬而未决的谜题。在几代考古人不懈努力下，在历经多次大型考古发掘后的古燕国遗址中，终于寻到北京悠久建城史的珍贵物证，将北京建城史推进到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

这就不能不提两件“稀世珍宝”：董鼎和伯矩鬲。

董鼎 1974 年出土于琉璃河遗址 253 号墓。“董”是第一代燕侯“克”的近臣，鼎内铭文记录了这位董远赴周王都所在地奉献食物一事，因做器者是董，该鼎被命名为“董鼎”。董鼎古朴浑厚、雍容大气，是目前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

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力凡介绍，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体积如此巨大的鼎，反映了当时北京地区的矿冶与铸造行业规模很大，生产技术高度发达。

“董鼎造型雄浑凝重，纹饰简洁古朴。其器形、纹饰、铭文与黄河流域商周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说明三千多年前，北京地区已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同中原地区在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形成了统一的整体。”于力凡说。

伯矩鬲则在 1975 年出土于琉璃河遗址 251 号墓。“伯矩”是燕国贵族，盖盖内及颈部内壁铸有相同的铭文，记述了燕侯在戊辰这一天赏赐伯矩贝币，伯矩做器纪念父亲的史实。鬲的各部均以牛头纹装饰，共有七牛，艺术设计和铸造工艺极为高超，是北京地区西周青铜艺术巅峰之作。

燕国在八百多年的时光中，曾创造了辉煌的都市文明与地域文化，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存。专家们指出，通过鼎与鬲的文化气质，燕国先民们精神世界的古光片羽并不难窥见。他们认为，天乃万物之创造者，故而敬之；地

乃万物之养育者，故而倾之。他们心存敬畏，克己修身，敬德保民，蔓延根脉，终于成就日后辉煌。

“与其他诸侯国相比，燕国国祚能够延续如此之长时间，与先民们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密不可分。”于力凡说，“燕地汲取了南北交通要冲的地理优势，造就了燕文化中敢于担当，包容开放的精神品质和人文情怀。”

第 5 次大型考古发掘十多年后，科技得以以全新方式赋能考古。2019 年开启的琉璃河遗址新一轮发掘实现了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的有机融合。琉璃河遗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遗址中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将遥感考古、航空摄影、电法物探、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统一到一大遗址“一张图”中，并摄像记录了发掘全过程，逐层进行绘图、摄像、建立三维模型，全面收集信息。

“这意味着，即使百年之后的人们也能很容易地找到我们发掘的点位，找到已知的分布点。”北京市文物局考古处处长郭京宁说，“这张图”将随着考古发现不断更新。

同时更新的还有北京城市发展的大地图：具有“中国硅谷”之称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吸引不少国内外知名企业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落户，成为高能级创新主体集聚区；近年来，北京市服务贸易快速增长，保持全国前列；《中国城市知识产权指数报告 2022》显示，北京知识产权产出水平、流动水平和创造潜力全国第一……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如今，北京正在加快推进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到访者强烈感受到：先民们的创业精神，作为新时代中北京勇于创新的时代担当与包容天地的宽广胸怀的精神渊源，已在这片京华大地上——一脉传“城”、顶天立地。

（记者罗鑫）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

龙形器与黑釉马：

黄河臂弯“龙马精神”耀中华

“浊波浩浩东倾，今来古往无终极。”

在中国所有的大江大河中，无论从地理空间还是文化意义上来说，黄河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如果从高空俯瞰，这条全长 5464 公里、流经 9 省区的大河，宛如一条蜿蜒前行的黄色巨龙，从发源地青藏高原，一路浩浩汤汤，向东奔腾入海。

细观中华文明历程，时光荏苒五千余年，黄河不但从未缺席，还将它最深沉的文化印迹铭刻在中原大地之上。

《史记》有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1959 年，史学家徐旭生在“寻找夏墟”的田野考古调查中，发现了位于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拉开了探寻“最早的中国”的序幕。

60 多年的科学发掘中，考古人员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多项“中国之最”：最早的官城、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而更令人啧啧称奇的珍宝，是一件长达 70 厘米的绿松石龙形器。

现存于中国考古博物馆的这件龙形器由 2000 余绿松石片组成，龙头呈扁圆形，青、白玉组成鼻梁，圆饼形白玉为睛，绿松石鼻头硕大醒目，龙身则呈弯曲状，中部脊线向两侧下斜，尾尖内蜷，工艺精湛，栩栩如生。

专家称，这在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

伴随绿松石龙形器出土的，还有一件带石铃舌的铜铃，这与《诗经》中所记载的“龙旂阳阳，和铃央央”的祭祀场景颇为契合，引人无限遐想。

“这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布局严整的王朝大都，多项中国古代都邑和政治制度源于此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表示，二里头遗址对于探索中华文明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

“最早的中国”就这样在黄河柔嫩的臂弯中萌发、壮大，并不断向外辐射影响力。

岁月如梭。其间，奔腾的黄河巨龙在中原大地上反复“翻腾”“扭动”身躯，考验着他怀中那个年轻民族的智慧与韧性。而生机勃勃的中华民族则一次次战胜“水患”的磨砺，像一匹无畏的奔马，向着繁荣与幸福飞奔而去。

在洛阳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出土于 1981 年的唐代三彩黑釉陶马。

这匹“骏马”全身黝黑，只有马面、鬃尾和四蹄是白色，鞍鞅则是绿、黄、白三色相间，正是文献中“龙种神驹，四蹄踏雪”的真实写照，在唐三彩文物中也是非常罕见。特别是它雄健的体态与雄伟的气势，强烈地传递着一种炽热、高昂与昌盛的盛唐气象，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中华风范。

“黄河宁，天下平。”新时代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

黄河岸畔，河南也锚定了新发展坐标：“天下粮仓”，继续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打造“国人厨房、世界餐桌”；“中原腹地”，不断强化区位优势，依托“四条丝路”化身“开放高地”；农业大省，用“创新”点燃发展新引擎，提升经济核心竞争力；文物大省，推进文旅文创融合战略，用创意激活文化资源，打造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博物馆体系，让精彩的文化产品不断“出圈”……

如今，“母亲河”臂弯中的文化宝藏们，正见证着这块与黄河相生相依的中原大地，抖擞起驰而不息的“龙马精神”，奔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记者桂娟、袁月明）
新华社郑州 5 月 18 日电